

政府、企业和家庭在成都市下岗女工的社会支持网络中的作用

邹中正, 秦伟

(四川大学 公共行政与社会学系, 四川 成都 610064)

摘要: 本文运用经济支持、再就业支持和感情支持三个指标, 分析了在我国体制转型时期, 政府、企业和家庭在下岗女工的社会支持网络中的地位和作用。根据成都市的实际情况, 每个指标采用几个变量进行比较分析。这些指标和变量较准确地反映了成都市下岗女工的社会支持网络及下岗女工在寻求社会支援时的社会关系选择意向。文章研究结果表明, 政府和企业在下岗女工的社会支持网络中的作用很低, 家庭网络的作用较大, 并且在家庭网络中, 亲缘关系的作用最弱。

关键词: 下岗女工; 社会支持; 社会关系

中图分类号: C913.6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149(2001)06-0055-06

The Roles of Governments, Enterprises and Families in Social Support Networks of Laid-off Women in Chengdu

ZOU Zhong-zheng, QIN Wei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Sociology Department,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Abstract: Three indices (economic support, re-employment support, and emotional support) are used in this paper to analyze the status and roles of governments, enterprises and families in social support networks of laid-off women during the system transformation. Fitting actual situations in Chengdu, each index is expressed by several variables. These indices and variables exactly reflect social supporting networks of the laid-off women and the tendency of choosing social relationships when they seek help.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show that laid-off women get less help from governments and enterprises than from familial networks. Kinship is the weakest one among familial networks.

Keywords: laid-off women; social supports; social relationships

一、研究的问题

“下岗”是一个界定模糊, 现实意义大于理论意义的概念, 甚至在国家有关再就业工程的文件中对“下岗”也没有明确的定义。王汉生认为, 相对广义的“下岗”概念有三层含义: 第一, 职

收稿日期: 2001-06-04

作者简介: 邹中正(1976-), 男, 四川大学社会学硕士。

工本人原属国有或集体企业正式成员；第二，职工因企业原因（企业开工不足、停产、半破产等）而不是个人原因（如不遵守劳动纪律、不胜任工作等）无法正常上岗工作；第三，职工本人的劳动关系在无法正常上岗前仍然保留在原单位^[1]。下岗女工就是女性下岗工人，她们在新的就业市场中是处于劣势的群体。但是，她们又不同于其他弱势群体（如民工、无业人员等），她们不是城市社会的边缘人，而是原体制的核心力量——国家的主人翁。下岗女工这一体制身份使她们一方面保留与旧体制的劳动关系，享有旧体制赋予的社会保障，但对原企业几乎不再承担什么义务；另一方面，她们的具体工作岗位都在体制之外，包括正规的市场体制和新旧体制之间的空隙，体制外的工作为她们提供了主要的经济收入。而在体制外没有工作的下岗女工，要么会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寻找工作、要么寻求或依赖各方面的经济支持、感情支持等社会支持。

关于下岗职工的社会支持，已有许多研究，丘海雄认为，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企业的改革以及所有制的多元化发展，形成了体制内与体制外并存的二元劳动力市场结构。企业对工人的保障减少，而企业外可替代的资源逐渐增加。这就产生了下岗职工的社会支持结构从一元到多元的转变，即从以前的完全依赖企业转向与依赖企业、政府、家庭、社会、个人、同事、亲戚、邻里等各种关系^[2]。然而，以腾尼斯(Tonnies, F)为代表的早期欧洲社会学家和以沃思(Wirth, L)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认为，在都市社区里，由于人口的异质性、匿名性、流动性以及对正式组织的依赖性，使得亲密的首属关系被削弱了^[3]。家庭关系趋向表面化、浮浅化，甚至最终成为一个“同居的场所”，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注重同亲戚之间的关联和义务，亲戚关系衰弱。邻里关系这一在早期社会学思想中被认为是传统网络社会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在城市人的生活中也遭到破坏^[4]。

城市人生活中的夫妻关系、血缘关系、亲属关系、邻里关系、同事关系等是否被破坏了。如果是，那么，下岗职工的社会支持结构又怎么可能是多元化的。如果不是，城市下岗女工社会支持结构又是怎样的，她们是靠什么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几个问题：（1）政府、企业为下岗女工提供的经济支持和就业支持占多大比重，即下岗女工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社会支持的多元化；（2）家庭（包括夫妻关系、血缘关系、亲戚关系）在下岗女工的经济支持、再就业、感情上的地位和作用，下岗女工的家庭关系有何变化，原因是什么；（3）在家庭网络的几种关系（即夫妻关系、血缘关系、亲缘关系、私人关系）中，下岗女工寻求帮助的意向是什么，各种关系的作用和地位是什么。

社会支持涉及家庭内外的供养与维系，也涉及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支援和帮助。广义的社会支持包括：物质帮助，如提供金钱、实物等有形帮助；行为支持，如分担劳动、家务等；亲密的互动：满足倾听、关怀、理解、尊重；指导，如提供建议、信息和指导；反馈：对他们的行为、思想和感受给予反馈；正面的社会互动，即为了娱乐和放松而参与社会活动等六种形式^[5]。本文所用的社会支持，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物质帮助、再就业帮助（信息、指导、建议）、感情支持（倾听、关怀、尊重、理解），从这三个方面来分析下岗女工的社会支持结构以及下岗女工对社会支持的选择意向。社会支持的结构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见图1）

社会网络(正式社会组织)	组织	原单位
		政府机关
	市场	职介所、招聘会
		媒介
家庭网络(非正式组织)	夫妻关系	
	地缘关系	邻里
	血缘关系	自己父母
		配偶父母
		子女
	亲缘关系	自己亲戚
		配偶亲戚
	私人关系	朋友
同事		

图1 社会支持结构分类图

二、研究方法 & 主要结果

成都市下岗女工调查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进行。根据成都市下岗女工的总体比例，在成都市所辖七个城区进行分层抽样，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简单随机抽样，抽取下岗女工 500 人。问卷是当场发放、当场填写、当场回收的。发放问卷 500 份，回收 480 份，回收率 96%，其中有效问卷 421 份。

(一) 下岗女工的经济支持

经济支持主要用三个变量：A 下岗补贴(待岗工资)的数量及来源；B 借钱的对象；C 住房的房产权。

从分析中可知，下岗补贴的主要来源是原单位，占 81.4% (见表 1)。金额很低，0 ~ 100 元之间的占 11.6%，101 ~ 200 元之间占 56.5%，而从未领过的占 17.9% (见表 2)。而同期成都市的人均月收入为 595.08 元，人均每月消费为 483.08 元^[9]。因此，下岗女工所领到的补贴根本无法解决下岗女工的生活困难，她们必须寻求其他形式的帮助，如借钱、再就业等。

被访者中，借过钱的下岗女工有 296 人，占 70.3%。借钱的对象，血缘关系占 64.6%，亲缘关系占 4.3%，私人关系占 20.6% (见表 3)。从百分比来看，她们的第一选择是有血缘关系的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其次是朋友、同事等私人关系；最后是亲戚关系。这说明在解决临时困难、较小帮助方面，家庭网络关系具有很大的作用。

从住房所有权来看，完全是公房的占 34%；半公半私的占 14.5%；父母或公婆的房占了 15.4%，而完全有自己产权或自己解决住房问题的人占 29.4% (见表 4)。可见，单位在解决住房方面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

通过三个方面的分析发现，原单位在解决下岗女工的住房问题和下岗补贴方面占很重要

的地位,基本上解决了下岗女工的很大一部分日常生活需求,起到稳定人心,保证社会稳定的作用。而在此基础上,女工的临时困难或日常生活困难则寻求家庭、朋友的帮助。但亲戚关系所提供的各项帮助都远低于血缘关系、朋友和同事等私人关系提供的经济帮助。亲缘关系有一种弱化的倾向。

表1 下岗女工现在每月的下岗补贴情况

收入范围	未回答者	100元以下	101~200元	201~300元	301~400元	401~500元	500元以上	合计
人次	63	104	199	32	10	2	5	332
%	17.9	11.6	56.5	9	3	0.6	1.4	100

(表中的百分比是按未包括缺失值的数据计算的,下同)

表2 补贴领取单位

单位	原单位	就业局	其他	合计
人次	206	1	46	253
%	81.4	0.4	18.2	100

表3 借钱的对象

对象	自己父母	配偶父母	子女	自己兄妹	配偶兄妹	自己亲戚	配偶亲戚	自己朋友	配偶朋友	其他	合计
人次	81	7	2	95	6	11	2	58	3	31	296
%	19.2	1.7	0.5	22.6	1.4	2.6	0.5	13.8	0.7	7.4	100

表4 住房的产权

产权拥有者	未答	自己的产权	自己有半产权	单位公房	房管局公房	住父母的房子	住公婆的房子	自己租的房子	其他	总计
人次	18	115	61	107	36	46	19	9	10	421
%	4.3	27.3	14.5	25.4	8.6	10.9	4.5	2.1	2.4	100

(二) 下岗女工的就业支持结构

对再就业的分析,主要用四个变量,A 接受再就业培训的人数; B 再就业培训的举办单位; C 培训费用的承担情况; D 现在这份工作的获取途径。由于再就业培训与再就业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一般接受培训的女工都能找到一份工作,有的甚至就以接受培训为工作的形式,因此,本文使用了再就业培训作为分析再就业支持的指标。

在被访者中,接受过再就业培训的有96人,占总人数的22.8%,比例很小。

举办单位中,再就业机构占32.6%;原单位占13.3%;政府机关占10%(见表5)。可见,一方面,下岗女工接受再就业培训的机会并不多;另一方面,政府实施的再就业工程,在下岗女工的就业培训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主导作用。

从培训费用承担情况看,完全由自己承担的占58%,完全由原单位承担的只占9.9%。完全由再就业单位承担的占16.5%(见表6)。因此,在培训费的承担方面,以自己为主,政府指导下的再就业单位也占很大一部分,而原单位就明显很少。

工作获取途径:边燕杰研究指出,如果没有社会关系网的作用,60%~70%的职业流动就无从谈起^[7]。葛延风、樊立宏指出“在下岗职工的再就业领域,市场机制的作用依然很小,不仅90%以上的富余人员仍滞留原企业,通过市场配置的也只有20%左右,而在80%的非市场配置人员中,通过‘关系’重新获得工作的占相当大的比例^[8]。”对下岗职工来说“关系是她们的实

现个人行动策略的关键因素”，甚至“下岗职工只认关系，不认劳动力市场”^[9]。关系资源(主要是血缘关系、亲缘关系、朋友、同事等私人关系)在下岗女工和社会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这也许是中国社会的特点。

这次调查的结果显示，成都市下岗女工获取工作的途径中，市场配置占 22.7%，非市场配置占 77.3%，其中通过“关系”获得再就业的占 58.7%(见表 7)。与以前的研究结果基本是一致的。贺飞曾研究过市场转型过程中，职业获得方式的变化，他的研究表明，从 1980 年以前到 1993 年通过国家分配方式获得工作的比例，从 68.5%降到了 39.4%；通过市场获得工作的比例从 6.3%上升到 15.6%；通过“关系”获得工作的比例从 25.2%上升到 45%^[10]。总体上反映出国家再分配权力对人们的工作获得的控制力逐渐衰弱，而人际关系在工作获取中的作用大幅上升。成都市下岗女工的工作获得方式也证实了这一趋势和现状。下岗女工对政府的主观评价情况：有 237 人认为政府在再就业过程中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提供帮助，占总数的 56.3%。

另外，还可以发现，在关系网络中，朋友对于下岗女工的再就业作用大于亲戚的作用。

表 5 再就业培训的举办单位

单位名称	原单位	政府机关	学校	再就业单位	其他	合计
人次	12	9	17	32	20	90
%	13.3	10	18.9	35.6	22.2	100

表 6 就业培训的费用

培训费用的负担者	原单位	自己	原单位与自己各一半	再就业单位	再就业单位与自己各一半	其他	合计
人次	8	47	2	13	8	3	81
%	9.9	58	2.5	16.5	9.9	3.7	100

表 7 现在这份工作的获取途径

途径	原单位	政府	职介所	招聘会	亲戚介绍	朋友介绍	其他	合计
人次	7	4	30	18	23	86	43	211
%	3.3	1.9	14.2	8.5	10.9	47.8	20.4	100

(三)感情支持情况

下岗女工的感情支持，主要用三个变量：A 丈夫对自己的态度；B 下岗女工与孩子的关系；C 婚姻状况。

何景熙研究指出“无论劳动力是否充分就业，或不充分就业的程度如何，其婚姻关系都十分稳定，离婚，再婚人数所占比例都很低”，“劳动力就业充分与否对家庭稳定并没有产生显著的正面或负面影响^[11]。”

在下岗女工中，家庭关系基本上是稳定的，95%的下岗女工认为下岗后与孩子的关系没变或变好，只有 5%的人认为关系变差。

有 79.1%的下岗女工认为，丈夫对自己的下岗是持理解、支持和鼓励态度的。下岗后，夫妻感情的变化，有 83%的人认为没变或变好，原因主要是“夫妻交流增多”、“丈夫支持和鼓励自己”。

在婚姻状态中，只有 7%处于离婚状态，而成都市 1999 年的离婚率为 0.41%^[12]。仅从这一指标来看，下岗女工处于离婚状态的人比成都市的总体比例要高，但由于资料所限，尚不足以判断处于离婚状态的下岗女工是不是在下岗以后离婚的。综合前面几个指标来看，应该说下岗女工的家庭是稳定的，家庭的支持和帮助作用是巨大的，不可取代的。

表 8 下岗女工的婚姻状况

婚姻状况	在婚	未婚	丧偶未再婚	事实婚姻	离婚	合计
人次	327	38	7	5	29	406
%	80.7	9.3	1.7	1.2	7.1	100

三、结论与思考

(1)政府和企业在下岗女工社会支持结构中的作用很小, 家庭网络的作用则相对更大。

在下岗女工的经济支持方面, 企业只是在一定时期内向下岗女工发放少量补贴, 而这些补贴并不足以解决下岗女工的生活困难。有 17.9% 的下岗女工从未领取过下岗补贴, 有 68.1% 的下岗女工的下岗补贴在 200 元以下, 这样的补贴金额低于成都市人均收入水平 595 元和最低人均消费水平 483 元。

在住房方面, 下岗女工住的公房仍有很大部分, 但这只是在从旧体制向新体制转型过程中, 旧体制下既有利益的暂时延续。这并不是企业或政府针对下岗女工所采取的补偿或社会保障措施。在政府的再就业工程的文件中, 国家只强调发放基本生活费、最低生活保障费、再就业培训和指导等, 并没有把公房作为一种对下岗女工的政策性补偿。

在再就业培训方面, 只有 22.85% 的人参加过培训。而在培训费上, 71.4% 是自费或自己承担一半的费用。在工作获得方式上, 只有 4.2% 的下岗女工是通过政府或原单位实现再就业的, 而 58.7% 是靠自己的“关系资本”找到工作的。这体现了政府、企业在转型时期控制力、再分配能力的衰弱。相反, 随着改革的深入,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 传统体制之外的可替代资源增多, 使下岗女工选择的机会增多, 对企业和政府的依赖减弱, 家庭网络的作用充分体现出来。

(2)在家庭网络关系中, 亲缘关系的作用明显低于血缘关系、夫妻关系以及私人社会关系的作用。亲缘关系相对弱化, 而业缘关系(同事、同学、朋友)强化, 家庭关系基本稳定。

(3)从总体上说, 城市下岗女工的首属群体关系并没有被削弱, 家庭也并没有变成“同居的场所”, 在下岗女工的社会生活中, 首属群体关系仍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下岗女工的社会支持是多元化的。下岗女工寻求社会关系的支援时, 社会关系的选择意向首先是夫妻和血缘关系, 其次是私人社会关系, 然后才是亲缘关系。

参考文献:

- [1] 王汉生、陈智霞. 再就业政策与下岗职工再就业行为. 社会学研究, 1998 (4).
- [2] 丘海雄. 社会支持结构的转变: 从一元到多元. 社会学研究, 1998, (4).
- [3] 蔡勇美. 城市社会学. 台北远流图书公司, 1984. 14—15, 22—27.
- [4] 何肇发. 社区概论. 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1. 267—269.
- [5] Manuel Barrera. JR. &Sheila L. Ainslay (1983)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Support: A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J],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Volumn 11, April.
- [6] 成都统计年鉴 2000 年.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0. 7. 146—148.
- [7] 王汉生, 陈智霞. 再就业政策与下岗职工再就业行为. 社会学研究, 1998 (4).
- [8] 葛延风、樊立宏. 影响职工再就业的体制反思. 现代企业导刊, 1996, (12).
- [9] 同 [1]
- [10] 贺飞. 市场转型过程中职业获得方式的变化[J], 社会学, 2000, (12).
- [11] 何景熙. 不充分就业及其社会影响——成都平原及周边地区农村劳动力利用研究. 社会学, 1994 (4).
- [12] 同 [6]

[责任编辑 崔凤垣]